

智

慧

魏·刘劭 著 刘昞 注 杨新平 张锱生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人物志

魏·刘劭 著 刘昞 注 杨新平 张锴生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知自慧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志/(魏)刘劭著;(凉)刘昉注;杨新平,张锴生
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1

(智慧之门)

ISBN 7-5348-2286-6

I. 人… II. ①刘…②刘… ③杨…④张…
III. 人才学-中国-三国时代 IV. C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240 号

责任编辑:谢全堂

责任校对:温向苏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9.5

字数:22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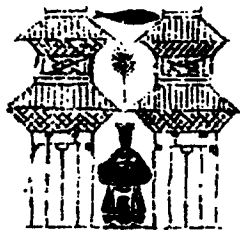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286-6/G·517 **定价:**1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岁月和思想历程中,遗留下来许多光照千古、传之万世的不朽著作,闪耀着中华民族杰出人物光辉思想的千古火花,并在世界思想史、文化史的发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感知万物、预测万事的《易经》,阐述道化、无为而治的《老子》,中庸处事、可治天下的《论语》,奇正变化、百战不殆的《孙子兵法》,载叙人物、纪传传世的《史记》,资于治世、以史为鉴的《资治通鉴》,但在识才用人、成就大业方面,却有一本藏之名山、登峰造极的不朽著作——《人物志》。由于此书所涵盖的理论,融会贯通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思想,在知人、识人、用人、培养人诸方面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和博大精深的论述,并把它们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宋代阮逸评论说:



“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繁括。”明代郑旻评论说：“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前人都对此书评价极高。20世纪30年代，此书被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施莱奥克(J. K. Shryock)译成《人类能力之研究》，并在美国出版，至今在欧、美、日本仍有众多的研究者，并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人物志》一书的作者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据《三国志·魏书·刘劭传》所记载：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他的生卒年月在史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故暂不可考定。

关于刘劭之名，《三国志·魏书·刘劭传》上为“劭”字，隋唐《经籍志》著录《人物志》皆为“刘邵”撰，唐代刘知幾《史通·自序篇》却提“故刘劭《人物志》生焉”，宋代阮逸《人物志序》及明清两代各种版本中如《四部丛刊·人物志》（据明正德本影印）与《四库全书·人物志》本大多皆为“邵”字。《四部丛刊·人物志》中所载《刘邵传略》中宋代宋庠考证说：“据今官书《魏志》作勉劭之‘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晋邑之名。案：字书此二训外，无他释。然俱不协。孔才之意，《说文》则为‘邵’，音同上。但召旁从卩耳，训高也。李舟《切韵》训美也。高、美又与孔才义符。杨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写《法言》亦作邑旁。‘邵’，盖力、卩文近易讹，读者又昧偏旁之别，今定从‘邵’云。”我们认为：刘劭本名应为“劭”字。后来，到南北朝西凉时，刘昞为其书作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凉州后，士庶东迁，夙闻刘昞其名，拜为乐平王从事中郎。刘昞所注刘劭的《人物志》一书，也必流传于北魏。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之兄彭城王名元劭，当时所流传之《人物志》为避元劭之讳，故改为“邵”。此事当有旁例，如北齐有邢劭其人，《北齐书·邢邵传》、《北史·邢邵传》皆作“邵”字，《北齐书·邢邵传》云：“少时有避，遂不行名。”故《资治通鉴》卷第



一百五十四胡三省注“刑子才”条却云：“邢劭字子才，避魏主兄彭城王劭讳，故以字行。”《三国志》为晋人陈寿所著，当时还未有北魏王朝，自然不应避讳，在年代上又离曹魏很近，档案资料尚存，在刘劭之名上似不应出现错误。所以，我们认为，刘劭之名是在北魏时期为避彭城王元劭之名讳，在《人物志》一书上被改为刘邵的，隋唐《经籍志》和后世《人物志》版本又大多从之。

刘劭在东汉建安(196年—219年)年中，曾做过府郡的计吏之类的小官。到许都后，曾在尚书令荀彧处所倡言不必为日蚀废辞朝会与聚会，深得荀彧嘉许。后拜为太子舍人，又升迁为秘书郎。

魏文帝曹丕黄初(220年—226年)年间，又改任尚书郎、散骑侍郎。受魏文帝诏，集五经群书分类汇编，作《皇览》一书，以供君王择要分类阅读。从这点可以看出，刘劭博览群书，深谙先秦两汉各家流派学术思想渊源。

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刘劭出任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太守，治绩卓著。朝廷又征召他为骑都尉，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册定法律，作《新律》十八篇，又著有《律略论》，由此可见，刘劭在法制上也颇有建树。后来，又升任散骑常侍。当时传闻辽东公孙渊受了东吴孙权封予的燕王称号，大臣皆主张派兵征讨，独刘劭以为不可。他认为公孙渊之父公孙康当年曾斩袁尚兄弟之首效忠朝廷，现在应该加以宽贷，以待其变。后来，公孙渊果然也斩孙权使者之首送来魏都。魏明帝青龙(233年—236年)年间，东吴军队围困合肥，当时，东方守边的将士都在休整，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朝廷派兵，刘劭建议先派数千精兵，虚张声势，使东吴军队以为魏国大军赶到，惊恐逃走。后来，果如刘劭所言。从这些事件的处理上，又可以看出刘劭具有卓越的谋略才能。魏明帝景初(237年—239年)年间，刘劭受诏著《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开官吏考核的条文制定之先河。此外，刘劭曾写过《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等，文辞优美，深受魏明帝的赞美嘉许。



另外,为移风易俗,刘劭还著有《乐论》十四篇,不料,恰逢魏明帝驾崩,来不及颁布施行。从这些又可以看出,刘劭又富有文学艺术才能。

当时,魏文帝下诏求贤,散骑侍郎夏侯惠上书推荐刘劭说:我见常侍刘劭,内心忠厚,意志坚定,考虑问题比较周全并且符合天数,凡是遇到错综复杂的大事,必定考虑其源远流长的前后关系,因此,不论众人才能大小,都学习他与自己相近的长处而细加斟酌度量。所以,本性诚实的人都佩服他平和公正,清静不争的人都羡慕他谦虚退让,崇尚儒学的人都赞扬他推理详密,逻辑严密的人都清楚他法则精通,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深不可测,喜好写作的人都深爱他著论文辞,主张法制的人都尊奉他化繁为简,长于谋略的人都称赞他玄机妙化。所有这些论述,都是赞扬他的群才各取适合于自己的长处而推举的刘劭才能的某个方面。基于以上这些评价,夏侯惠认为:像刘劭这样不是世上所常见的奇才,适宜于辅佐机要大事,应该接纳他运筹帷幄,也即推荐他担任丞相重职,执掌军国大事。从以上这些论述来看,当时人们对刘劭的各种才能评价甚高,只是时运不济,当时正逢司马懿专权的时代,正直之士不屑卖身投靠,与之为伍。所以,历史没有给刘劭一个施展才能与抱负的机遇。

后来,到魏齐王正始(240年—248年)年间,刘劭已不问政事,专以讲解儒家经学,被赐予关内侯的爵位。他死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勋。

二

三国时代,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辈出的时代,历史造就出诸葛亮、庞统、关羽、张飞、赵云、姜维、周瑜、鲁肃、陆逊、郭嘉、司马懿、钟会、邓艾等一大批文武人才,曹操更是提出了惟才是举的崭新口号:“治天下,平时尚德行;有事尚功能。”这才上演了一幕幕龙虎英雄风云际会的历史大剧。刘劭《人物志》也就产生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刘劭博览群书,学贯百家,他荟萃融合了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先秦两汉学术思想流派的精华,并把前贤知人用人的思想提炼、升华后,才得以创作出这一人才学上的绝世之作——《人物志》。

我们综观《人物志》全书,可以看出,刘劭的人才学理论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人才的本体论。

在人的各种资质及其表现特征方面,刘劭在《九征第一》中认为:人的德才的本源,是出自于人的思想和本性。凡是有生命的物体,没有谁不是以元气为本质的,凭阴阳二气形成个性,依金、木、水、火、土相生而形成筋、骨、血、气、肌肉的形体。通过形体与素质,可以去探索人的思想与本性。在人体自身的素质能量中,以各种性情中的中正和谐最为珍贵,只有这种平淡的性情,才能协调发展成为仁、义、礼、智、信这五种优秀品德。关于中庸平淡的思想,著名大学者钱穆曾评价说:“刘邵所用‘平淡’二字,明是老庄思想;但其用‘中庸’二字,则自儒家来。刘邵将此儒、道二家思想配合而自创一新说,此在汉儒中甚少见。”关于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这只是阐述了其内涵。到西汉董仲舒时,已把这五种品德称为五常,列为“三纲五常”学说的重要内容。东汉王充在《论衡》中认为:人性情的善恶贤愚,全在于“五常之气”的厚薄多少。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是没有讲清五常的本质。刘劭认为:“骨植而柔者,谓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质也。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矣。”显而易见,他通过元气形成人的形体,人的形体又是“五常”的本质的层层推理,已把人的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归结于从元气中



产生,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同时,他又认为“五常”是代表五种不同物质的品德。即:“五常之别,列为五德。是故温直而扰毅,木之德也。刚塞而弘毅,金之德也。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宽栗而柔立,土之德也。简畅而明砭,火之德也。”这显然是从《尚书·皋陶谟》中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九德”综合发展而来,又参照了《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金、木、水、火、土“五形之人”的分类法,这种把人的品德按五种物质归纳成五类的分类方法,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至于人的品德精神的特征(即所谓“征神”)怎样表现出来,古人多认为眼神可以表现人的品德的特征。《孟子·离娄上》与《周书·官人解》中都有评说,但都不完善。刘劭认为:人的外在仪容、声音、目光的变化,均发自于内心。所以,真诚的仁爱,必然显露出温柔的神色;真正的勇敢,必然显露出坚强的神色;真实的才智,必然显露出明达的神色。仁慈的目光,体现出的是心灵的精华,给人以诚实正直的印象;勇敢的目光,体现出的是肝胆的精华,给人以光亮逼人的印象。但以上皆是偏才,因为其内在资质是通过某种特别突出的形体特征表现出来,并不精纯,所以,人体上的整体机能就得不到充分的控制与发挥。惟有中庸之道的品德,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合而为一,中和成一种平淡的味道与本质。五种品德的资质充实于内心,五种品德的精华外露于目光中,因此,眼光中放出的神采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光辉。所以,刘劭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物生有形,形有精神,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可以看出,刘劭对“征神”的阐述更全面完备,更有实践意义。为了更进一步探索人的性情的特征,刘劭又总结出“九征”之说:善良与邪恶的本质全在于元神,明慧与愚蠢的实体全在于元精,勇猛与胆怯的态势全在于筋腱,坚强与懦弱的培育全在于骨骼,暴躁与镇静的先决全在于气血,悲伤和欢喜的情感全在于脸色,衰退与端正的形态全在于仪



表,奸邪与宽容的变化全在于面容,和缓与急切的情状全在于语言。这种方法比较系统而完备,对于识别人才具有较大的实用意义。

关于人的资质与洞彻事理的关系,刘劭在《材理第四》中认为:由于事物的原理有四种情况,阐明这些原理也就形成了四家流派;各家的性情又因与事理不尽相同,于是就产生了九种偏见;如若性情不精纯通达,就容易出现七种似是而非的现象;在阐释事理时不洞彻,则会形成三种失误;在辩驳时不谨慎,就可能产生六种不同的情绪;要想通晓天下情理,就必须具备八种才能。刘劭对上述四种原理、四家流派、九种偏见、七种现象、三种失误、六种情绪和八种才能的论述详细精辟,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其人才理论中博采众家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略窥一斑。

关于人的资质与所具才能的关系,刘劭在《材能第五》中认为:人的能力,出自于人的才智,而人的才智的大小是不一样的。才智不同的人才,应该担任不同的职务。他们一旦参与治理国家,就必然会采取不同的治国方略。因此,他详细探讨了八种人才所适宜担任的职务及他们各自的治国方略。

关于人的个性及其所适宜从事的职业,刘劭在《体别第二》中认为:在个性方面,抗奋进取和拘谨保守都违背了平淡通达的中庸之道。人的个性可以分为十二种,他详细地阐述了这十二种个性的优劣之处及其所适宜的工作。这不仅是对《逸周书》上所列举的十二种个性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其独到之处,还在于针对这十二种人才的优劣,提出了怎样充分发挥他们才能的方法。

关于人才的各种类型及其所适宜担任的职务,刘劭在《流业第三》中认为:人才的类型可分为十二种,其中以一身兼具德、法、术三种才能的国家脊梁一类的国体人才为最高智慧人才。根据这十二种人才的特长,他又分别指出了他们各自适宜担任的职务。而对于其中六种人才,他在《利害第六》中又特别指出



了他们的职业利弊。三国以前的人才分类杂乱肤浅,刘劭的人才分类方法简明、清晰、准确、实用。至于刘劭的十二种人才的“十二用”方法,则是对《逸周书》和《大戴礼》所阐述的“九用”的继承与发展,这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部分是关于人才的认识论。

关于怎样识别人才,刘劭在《接识第七》中认为:由于人的性情的本源是非常难以探索的,许多人能够认识与自己同一种类型之人的优点,却不能认识与自己不同类型之人的长处。所以,精通一种流派才能的人,能认识和发掘同一种流派之人的长处;兼具两种流派才能的人,能认识和发掘两种流派之人的长处;具备各种流派才能的人,那就能认识和发掘各种流派之人的长处。至于在接谈中如何了解一个人是兼才还是偏才,刘劭列出了区别的方法,还指出了偏才常犯的过失。

关于怎样认识、评价英雄人才,刘劭在《英雄第八》中认为:聪明杰出的人可以称为英才,胆力超凡的人可以称为雄才。聪明必然从策划谋略开始,英明卓识又能见机行事,其胆识又具备临机决断的能力,惟此才可以成为英才。气力超过常人,勇气又能遇难而行,才智又足以决断事宜,惟此才可以成为雄才。所以,英才只可以为相,雄才只可以为将。在一个人身上,是英才的成分多一些好呢?还是雄才的成分多一些好呢?英才与雄才的素质与成分的多少,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决定性因素。英而不雄,则群雄不服;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如若一人兼有英雄双才,则可以驾驭天下英雄。能驾驭天下英雄,则可以成就大业。虽然“英雄”称谓已散见于先秦典籍中,东汉末年王粲又著有《汉末英雄传》,但刘劭这样深刻的英雄理论,详细精妙,前所未有的确是英雄理论中的千古绝唱!

关于怎样识别和挖掘人才,刘劭在《八观第九》中认为:众多的人才性情品质种类各异,理想志向也不尽相同,如何观察他们是否通达顺畅,所依据的标准有八个方面。即:“一曰观其夺救,



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刘劭的“八观法”较之《太公六韬》中的“八观法”与“六观法”、《逸周书·官人解》中的“六观法”、《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法”以及诸葛亮的“七观法”有不少的继承与发展，具有不少科学的成分，颇具实用的价值。

第三部分是关于人才的发展论。

关于认识人才的复杂性及其局限性方面，刘劭在《七缪第十》中认为：由于人才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局限性，在辨别人才的种类、优劣等方面的道理上，其中奥妙无常的地方又难以详尽阐明，当人们按照自己的性情去鉴定考察不同的人才时，存在的谬误大约有七种：一是考察人的声誉时，有偏颇不全的错误；二是待人接物时，易受爱憎的干扰；三是审查人才志向时，有不分大小的失误；四是品评人物素质时，不能区别早智与晚成；五是辨别人才类型时，有同类相敬或相争的迷惑；六是评论人才时，有提携亨通者、压抑失意者的偏邪；七是观察奇才时，有分不清尤妙、尤虚两种人才的过失。这些都对人才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刘劭在书中对每一种谬误都有全面详细的阐述，其真知灼见很值得今人吸取。

关于人才自身的发展变化与任用者的复杂心理方面，刘劭在《效难第十一》中认为：了解人才存在两方面的困难：一是难以识别的困难；二是虽然了解却无从推荐的困难。由于人的天资、性情精妙细微，所以，了解人才的精神实质和外在表现的方法很难把握。因此，一般人在了解人才的外在表现上常用八种虚浮的方法，在考察人才的本质特征时，常犯七种错误。人在不同的境遇里，还常常发生五种不同的变化。因此，常常得到的是盛传不实的一般人才，而失去符合实际的人才。对此，刘劭提出了“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



取”的五种掌握人才性情本质的观察方法,具有很实际的应用价值。然而,即使了解了人才的资质才能,也并不是以认识人才的不同情况,至于实际生活中,也还存在着推荐人才不被重用和人才无法举荐的种种困难,对此,刘劭都有详细的阐述。这是一种把“知人之难”的问题,放在一种发展变化的状态中去解决的方法,对于今日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关于增强人才自身修养方面,刘劭在《释争第十二》中认为:美德中最高尚的是不自我夸耀,谦让才是事业成功的顺达之路,而骄横凌弱则是自毁前程的危险之路。君子与小人有不同的行为准则,而争夺与谦让的差别也十分明显。争强好胜之人有六种作为,并容易产生一些弊病。相互仇视无异于自我毁灭,怀恨争斗其实是自我诋毁。他论述了争强好胜之人的苛求心理与贤良君子的宽容心理,以及争强忍让的祸福变化。《老子》中说:“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刘劭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君子的“不争”之道,一是主动地谦让;二是积极地丰富充实自己;三是战胜敌手而不见争斗。只有超越三等世俗之人,追求崇高的道德境界,才能道德声望媲美于古代圣贤。

通过上面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一个轮廓:刘劭的人才学理论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人才的本体论。在这一部分理论中,又分成五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才的生理素质的理论。二是关于人才的心理素质的理论。以上两方面的理论,主要反映在《九征第一》中。而且是一讲人才先天的生理素质,二讲人才后天的心理素质。他认为人才的生理素质是其心理素质的基础,而心理素质又是其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三是关于人才个性的划分。这主要反映在《体别第二》中。他一共划分了十三种个性,并提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对不同个性之人又提出了不同的使用方法。四是关于成才规律的探索。这主要反映在《材理第四》与《英雄第八》中。他认为人的八种本能聪、思、明、辞、捷、守、攻、夺经过



自然发展,再与事理规律结合,或单独、或几种相结合就形成人的才能。五是关于人才的类别划分与如何使用。这主要反映在《流业第三》、《才能第五》与《利害第六》之中。他一共划分出十二种人才,指出了他们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对他们的不同使用方法。

第二部分是关于人才的认识论。在这一部分理论中,又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关于识别人才的主体条件。这主要反映在《接识第七》中。他指出八种人才在识别人才时的各自标准与不同的失误,认为只有具备各种流派才能的人,才能认识不同流派的长处。这就是说,对人才有选拔或推荐资格的人,他自身所具备的各种流派知识与才能的多寡,是认识人才种类多少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关于识别人才的素质与学识。这主要反映在《接识第七》与《英雄第八》中。他区分出英才与雄才所具备的聪、明、智与胆、力、勇六种素质,并按照不同的素质组合,指出了他们适宜担任的不同职务。而对于不同人才的学识,刘劭在《流业第三》中是按照学识与才能的十二种标准来划分的。在这十二种人才的学识中,他特别看重兼具德、法、术三种学识的人才。三是关于识别人才的各种方法。这主要反映在《九征第一》、《接识第七》、《八观第九》、《效难第十一》诸篇中。如在《九征第一》中以“九征法”观察人的精、神、筋、骨、气、色、仪、容、言,从而区分人才的善良或邪恶、明慧或愚蠢、勇猛或胆怯、坚强或懦弱、暴躁或镇静、悲伤或欢喜、衰退或端正、奸邪或宽容、和缓或急切等九个方面。在《接识第七》中,他主张通过与八种人才交谈,特别是对国体之人具有的德、法、术三种学识的交谈,从而详细了解不同人才的不同学识。在《八观第九》中,他主张通过观察人才在救援、感变、特质、作为、爱敬、情绪、短处、聪明等八方面的表现,来了解人才的综合才能。在《效难第十一》中,他提出“居视其所安,达视其所举,富视其所与,穷视其所为,贫视其所取”的“五视”观人法,从五个不同的方面来观察人才的所作所为。



第三部分是人才的发展论。这一部分理论,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才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主要反映在《七缪第十》与《效难第十一》中。其一是人才早亡的自然因素;其二是人才清高不群的自身因素;其三是生不逢时的时世因素;其四是举荐者的自身因素,或是举荐者对人才难以识别,或是举荐者虽然了解却难以推荐。二是关于人才发展的有效途径。这主要反映在《释争第十二》中。其一是主动地谦让,其二是积极地丰富充实自己,其三是战胜敌手而不见争斗。这些既是人才发展的“不争”之道,也是《老子》的“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精髓。

刘劭的人才学思想博大精深,是他著作中的精华。我们认为,在人才学领域,直到今天为止,古今中外还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一理论。另外,刘劭还有一些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的理论,在书中的一些篇章中皆有反映,并与他的人才学思想交织在一起,我们就不在此一一列举。

三

《人物志》成书以后,西凉儒林祭酒刘昞感其书言简意深,为其书作注,实质上是对此书的增补,以便后人能充分理解书中的深意。隋唐《经籍志》均把此书列入名家之中。唐代刘知幾的《史通·自序篇》评论说:“五常异,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李德裕《李卫公外集》评论说:“余尝览《人物志》,观其索隐精微,研几元妙,实天下奇才。”此后就藏之名山,世人少知了。只是在《人物志》的历代版本之序跋中,有宋代阮逸、文彦博(字宽夫)、宋庠、王三省,明代郑旻、李芮、刘元霖,清代彭家屏、纪昀等人的评论。

《人物志》的丛书版本有以下几种:

《汉魏丛书·子籍》(万历本、景万历本)。

《广汉魏丛书·载籍》(万历本、嘉庆本)。



《两京遗编》(万历本)。

《快阁藏书》(天启本)。

《增订汉魏六朝别解·子部》(崇祯本)。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乾隆本)。

《增订汉魏丛书·子余》(乾隆本、红杏山房本、三余堂本、大通书局石印本)。

《墨海金壶·子部》(嘉庆本、景嘉庆本)。

《守山阁丛书·子部》(道光本、鸿文书局景道光本、博古斋景道光本)。

《畿辅丛书》(光绪本)。

《玉尺山房术数奇书》(光绪本)。

《玲珑山馆丛书·术数编》(光绪本)。

《龙谿精舍丛书·子部》(民国潮阳郑氏用守山阁本参中州彭氏本刊)。

《四部丛刊·子部》(初次印本、二次印本、缩印二次印本)。

《四部备要·子部儒家》(排印本、缩印本)。

《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两京遗编》。

《人物志》的单本版本有如下几种：

明嘉靖八年顾定芳刻本。

明隆庆六年梁梦龙刻本。

明万历五年李尚刻本。

明刻本。

明钞本。

在以上诸本中,最早的当是《四部丛刊·子部》中据明正德刊本影印的《人物志》,我们遂依据此本为底本,参校以《汉魏丛书》本、《两京遗编》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龙谿精舍丛书》本等。

在注释与译文中,为了不与刘昞的注释混淆,我们采取只注



刘劭《人物志》原文，不注刘昉注文，个别脱字的地方才加以注释。在原文和译文的排版中，刘劭《人物志》原文和译文以大一号字体排出，刘昉注文与译文用小一号字体并加以括号排出。刘昉注释因对刘劭《人物志》原文是一补充，故一并译出。

在注释与翻译的分工中，杨新平负责前言、刘劭原序、九征第一、流业第三、材能第五、利害第六、接识第七、英雄第八、附录二、附录三等部分的注释与撰写。张锴生负责体别第二、材理第四、八观第九、七缪第十、效难第十一、释争第十二、附录一等部分的注释。

刘劭的著作博大精深，我们注释的能力水平有限，错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